

# 邓小平政治思维的基本特征

○ 朱仁显

邓小平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结合中国国情,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作了独到的理论阐述,形成了有其特色的政治思想体系,及其政治思维特征。

## 一

在我国传统政治文化中,人们常从修身养性、纲常伦理的角度议论政治,清谈之风盛行。建国以来,同样不乏有人把社会主义政治变成几条干燥乏味的原则,抱着本本空发议论,回避现实政治问题,以虚幻的价值尺度进行姓“社”姓“资”的评判,政治遂被化为无休止的论争而日趋空洞化。邓小平政治思维的突出特征就在于向根深蒂固的的会议政治、空头政治挑战,以务实求真的态度和思维方式来研究、思考、解决政治问题、设计政治方案、推动政治进程。

首先,邓小平强调一个国家的政治建设、体制改革要实事求是,既不能从本本出发,也不能从主观愿望出发而必须从实际出发,顺乎国情。这是我们从事政治体制改革,解决政治问题必须遵循的一条重要原则。他反对死抱着马克思主义教条,强调要根据现实的新条件、新特点,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在设计、规划中国政治改革时,邓小平始终反对那种脱离实际,停留于理论、原则层次上的空谈政治,他格外重视分析中国国情。例

如,他曾多次指出我国人口多,国家大,耕地少、底子薄,生产力落后,搞现代化建设,制定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必须重视和认真考虑这些国情。论政治方面,他指出,社会主义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实现人民民主奠定了基础,提供了保障,但是也应该看到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特权现象有时受到限制、批评和打击,有时又重新滋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依然任重道远。谈到社会主义,他认为我国目前最现实也是最大的国情,就是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sup>①</sup>所以,他强调我们搞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里没有抽象的思辩、空洞的陈述,完全是从当代中国的国情出发,立足于当代中国实际来谋求政治发展和社会进步。对于本国政治是如此,对于其它发展中国家,他也坚持这个原则。80年代他曾多次对一些想搞社会主义的非洲国家领导人说:“不要急于搞社会主义。”作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他之所以如此说,是由于他政治思维中务实品格的

影响,在他看来,搞社会主义,不是某种教条、原则的要求,而是现实生活的要求。当现实生活还没有把搞社会主义的条件和要求提出来时,硬着头皮照书本的条条去搞,那是绝对搞不好的。

其次,他反对离开生产力抽象谈论社会主义,鲜明主张要从发展的实际出发,认识社会主义。邓小平十分强调坚持生产力标准,概括起来包含以下观点:马克思主义要注重发展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发展生产力,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发展生产力是党和政府的政治路线,四化建设是“今后主要的政治,离开这个主要的内容,政治就变成空头政治,就离开了党和人民的最大利益”。社会主义曾经长期被人们抽象出来加以描绘、设计、论证,因为离开了生产力水平,它也日益变得不可捉摸,失去生命力。邓小平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突出贡献就在于他把社会主义重新放到生产力这一基石上进行界定,使社会主义重新从天上回到人间,恢复了它的生命活力。

再次,在政治评价方面,他确立了注重实绩、实效的价值评判尺度。回避现实问题,不顾实效进行空谈,曾经造成中国人长期的政治评价尺度的混乱,也使政治评价充满了主观随意性,政治无可奈何地滑入唇枪舌战的境地。当许多人被一些“理论”、“主义”、“原则”、“教条”搞得异常狂热的时候,邓小平却冷静观照,确立了政治评判方面务实的尺度。1983年,他指出:“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sup>[9]</sup>1992

年,他进一步提出“三个有利于”,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sup>[10]</sup>,作为判断我们各项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其价值尺度的根本精神就是注重实效、实绩。

最后,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体制改革的操作上,他主张也要根据国情稳步进行。在他的政治思想中,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主题,他一再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sup>[11]</sup>。但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方面,他反对不顾实际,盲目照搬资产阶级民主、三权分立那一套,反对采用大民主、大批判、群众运动的方式,指出“民主化和现代化一样,也要一步一步地前进”<sup>[12]</sup>,不能匆匆忙忙,急于求成,只能有领导、有秩序地逐渐进行。并且强调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要突出中国特色,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要正确处理民主和党、民主和集中、民主和法制、民主和专政四种关系,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断建立和健全决策和民主管理制度,切实保证人民管理社会经济生活的权利。当具体论及政治体制改革时,他也明确指出,我们必须有秩序地进行改革。这一系列思想表明邓小平始终不以乌托邦的态度来对待民主政治建设问题,他反对主观主义和任何形式的空想,脚踏实地,顺乎国情,稳步推进民主政治进程。

摒弃飘渺的理念、空泛的价值,从生产力角度来论述社会主义,从中国国情出发探索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这使得邓小平的政治思想始终保持客观审慎的特质,而这种特质使他成为20世纪世界政坛最具务实精神的政治家之一。

## 二

崇尚实践是邓小平政治思维的又一突出特征。他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并以实践

视角来分析和解决我国政治发展过程中的诸多问题。

第一,在实践中把握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解释社会主义。邓小平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教条主义。主张恢复实践的权威,用实践来检验真理,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重大理论问题上,他不从理论到理论进行空洞说教,不固守在社会主义问题上的传统认识,而是着力于从实践上把握社会主义的本质。根据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他首先排除了一系列附加在社会主义身上的错误观念,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不是社会主义,然后概括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这种对社会主义的崭新体认,绝不是得自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也不是因袭传统的社会主义观,而是来自生生不息的社会主义实践。

第二,邓小平强调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要勇于实践,在实践中发展。他反对墨守陈规,勇于向陈规旧俗挑战。他一再强调我们所从事的事业是前无古人的,没有现成的经验、既定的模式可以照搬,既然是从事崭新的事业,就不能裹足不前,就必须勇于思考,勇于实践,在实践中探索新的路子,新的办法。他反对改革开放过程中照本宣科,靠本本吃饭,迈不开步子,不敢尝试。提出在实践中,摸索总结经验,不断前进。并认为改革开放是比夺取政权更为复杂、更为艰巨的革命,不能象小脚女人一样,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sup>9</sup>,主张在实践中求发展。他提出“走一步,看一步”的实践方法,也就是“走一段就要总结经验。”<sup>10</sup>因为“我们现在做的事都是一个试验。对我们来说,都是新事物,所以要摸索前进。既然是新事物,难免要犯错误。我们的办法是不断总结经验,有错误就赶快改,小错误不要变成大错

误。”<sup>11</sup>这里所说的就是实践一段,总结一段,就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其中既包含有对原有实践经验的尊重,也包含对新的实践经验的追求,更包含了在实践中发展,在实践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实干精神。在设计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邓小平也始终坚持实践第一的精神,无不是在不断面对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实践中探索前进。

第三,他反对无谓的抽象争论,主张真抓实干。在我国文化传统中,空谈义理之风曾十分盛行。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坐而论道,抽象争论的现象也一直存在。例如,对市场经济的认识,人们往往习惯于先问它姓“社”姓“资”;对很多改革举措都要先查问“出身”,就此引经据典展开抽象的争论,无休无止。这种无谓的论争既无端耗费许多时光和精力,又严重妨碍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邓小平对此明确表示“不搞争论”。他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sup>12</sup>很明显,他提出“不搞争论”的目的是为了力戒空谈,争取时间,从事改革开放的实践。与此相适应,邓小平坚决反对形式主义的东西,还在1977年他复出时,就发誓要“少说空话,多做工作”。后来,他又多次表示反对无休止的开会、冗长的文章和一样冗长的讲话,认为“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即使是学习马克思主义,他也反对形式主义的学,他指出“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对于许多存而未决的事情,对于在改革开放中有不同观点和抱怀疑态度的人,他也认为要通过实践活动,用事实来说服,反对离开实践进行争论。总之,他主张凡事不要抽象地争论是非得失,而要放在实践中去检验,让实践说话。这一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的思维方式,十分有效地解决了改革开放以来许多理论和现实问题。

最后,他注重在实践中创新。邓小平不仅重视实践而且重视在实践中总结经验,进行

理论创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创新。他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他根据中国改革的实践,提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从理论上抛弃了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的错误论断;他提出兴办经济特区、“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祖国的构想等,都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社会学说的一种突破和创新。他之所以有这么多的创新是因为他摆脱了传统中国政治思维和社会主义运动中“左”的思维的禁锢,他不在乎那些吓人的教条、振振有词的说教,注意在生活的现实和实践中把握事物的性质和变动的趋势,在现实生活实践的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价值尺度,并以此评估一切书本上的知识和实践的经验。在他的政治思维中,有抽象的理论和原则,但是这些理论和原则不是冰冷的、教条式的,而是充满着生机的,有丰富的现实感和历史底蕴,而且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在实践中不断吸取营养、力量,不断突破和创新。正是这种执着的实践活动和理论创新,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事业在当代中国进入了新境界,达到了新的高度。

### 三

注重体制创新是邓小平政治思维的又一重要特征。如何认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运行中各种弊端的根源,从何处着手除弊兴利,以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速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这是我国政治生活中发人深思的问题。邓小平在这方面的论述鲜明地体现了他政治思维的现代品格。

邓小平首先明确指出,我国政治生活中存在的严重弊端主要根源在体制上。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邓小平切身感受到我国政治生活中的各种弊端,这些弊端集中表现为严重的官僚主义现象。“官僚主义现象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个大问题。

它的主要表现和危害是: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陈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sup>11</sup> 尽管这些弊端已严重到让人难以容忍的地步,长期以来也深受人们关注和痛恨,但始终未能有效地加以缓解和克服,原因就在于没有很好地透视其存在的根源。邓小平的政治睿智就在于洞悉了这些弊端滋生和泛滥的体制根源,指出“它同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sup>12</sup> 这种体制导致权力过分集中、党政不分、政企不分、政事不分,而管理过程又长期缺少严格的行政法规和个人负责制以及必要的规范。在总结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经验教训时,他又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地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sup>13</sup> 对现实政治问题和历史教训这一深刻的剖析,有效地帮助人们走出政治思维的误区——即单纯从思想意识、个人品质层面寻找政治病根,为推行政治体制改革,从而在根本上克服政治弊端,避免重蹈覆辙,奠定了理论基础。

其次,邓小平明确指出,要克服政治的种种弊端,要确保我国现代化事业的顺利进行、国家和社会的长治久安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选择。他曾经告诫全党:“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sup>14</sup> 对待官僚主义问题,他认为首先还是要着重研究体制的

改革,从历史的经验教训看,不从体制上入手,难有成效。“过去我们虽也多次反过官僚主义,但是收效甚微”,<sup>15</sup>其关键在于没有从制度上入手,“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sup>16</sup>。再如,我们“过去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分过几次权,但每次都没有涉及到党同政府、经济组织、群众团体等等之间如何划分职权范围的问题”<sup>17</sup>。因此,并没有解决权力过分集中这一体制上的总病根。这些论述告诉我们,要消除政治生活中的种种弊端,最根本的途径就是改革和不断完善政治体制。

再次,邓小平不仅首倡进行体制改革和创新,而且也为中国政治改革做了系统的设计。他从我国政治现实出发,提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内容。目标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内容包括:(一)实行党政分开制度,改变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状况,划分党和国家的职权,理顺党同人大、政府、司法机关的关系,使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这一原则具体化、制度化。(二)下放权力,理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扩大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群众和基层组织的积极性。其重要内容是政企分开。(三)转变职能,精简机构。就是按照政企分开,宏观管住,微观放开的原则,将政府机关职能的转变同机构改革、精简机构结合起来,改革计划、财政、商贸、金融、劳动等宏观管理体制,变政府对经济的直接管理为间接管理。(四)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其中主要包括:建立干部退休制度,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弹劾、轮换制度,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等。(五)完善基本政治制度。包括完善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人民监督和社会监督制度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六)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走向制度化、法制化等等。政治体制改革涉及面广,但是在这极广泛的领域里,邓小平始终强调要在制度上进行变革。也正因为如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十几年,我国的制度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政治和社会生活正在逐步走向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的轨道。

我国人治主义的传统源远流长,传统中国人莫不以为政治的好坏完全取决于为政之人的好坏,所以,总是将美好政治的希望寄托在明君、贤相、清官上,很少从制度上想办法。政治坏了,国家弱了,社会乱了,一概归咎于当政者的无德无能、贪赃枉法,而不怪罪于导致这一切的制度。所以政治的问题就被归结为如何造就理想的道德人格的问题,就变成无力的道德说教和呐喊。解放以来,我们依然无法摆脱人治主义的束缚,总是专注于意识形态的革命、思想改造、整风、政治说教等,长期以来忽视了政治制度的建设和完善,以至社会主义事业遇到重大的挫折。邓小平在总结历史教训过程中,深刻地领会人治的弱点,认识到人治政治的弊害,主张从制度入手,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从而根本解决现实政治弊端。走出人治政治的怪圈,这是中国政治思维的一次革命性变革,其意义至深,其影响至远。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政治学和行政学系)

责任编辑:益木

注:

<sup>15</sup>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5、252、23、372、372、113、174、374页。

<sup>16</sup>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8、168、327、328、333、333、328、328、329页。